



# 雪莱抒情诗选

# 雪莱抒情诗选

查良铮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 雪莱抒情诗选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216,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0\frac{1}{4}$  插页 3

1958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7年6月湖北第5次印刷

印数 242,501—275,500

---

书号 10019·1019

定价 2.05元

## 译者序

英国十九世纪诗坛上的两颗巨星——雪莱和拜伦，是我国读者久已熟悉的了。他们在热情的诗歌中发出革命的号召，不知感动了多少心灵。要是用一句话来概括他们的诗歌活动的话：可以说，他们是革命浪漫主义者，也就是英国工人运动尚在雏形时期的代言人。关于这，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曾经说：“雪莱，天才的预言家雪莱，和满腔热情的、辛辣地讽刺现社会的拜伦，他们的读者大多数是工人……”据马克思的女儿爱琳诺说，马克思曾称雪莱是“彻头彻尾的革命家”。

正因为如此，雪莱和拜伦长期以来受到资产阶级的辱骂、嘲笑和歪曲。这两位诗人一生的坎坷以及他们挺身与反动势力作毫不妥协的斗争的勇气，也是早已引起了广大进步人类的同情与赞美的。他们不但是自己所出生的阶层的叛徒，而且还是正当那一阶层（贵族、资产阶级）的统治最强大和最顽固的时期，起而与之对抗的。由此看来，他们的真知和远见，他们的冲破黑暗势力的大无畏精神，更是多么难能可贵呵。我们相信，这两位先驱诗人的充满战斗热情的诗篇，在今天是能得到充分的赞誉和正确的评价的。

在十九世纪初叶的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彻底改变了社会面

貌。社会迅速地分裂为一方面是贵族、资本家和极端富有者，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赤贫的无产阶级；旧日比较稳固的中间阶层不断地分化，小工商业者或者上升，或者下降。社会进步的动力无疑地落到了无产阶级的肩膀上。但此时的无产阶级本身还是比较薄弱的，政权还强有力地掌握在日益反动的贵族及资本家手里。在这种反动势力的统治下，工人运动尽管前仆后继，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还没有成熟发展起来：例如，较早的路德分子破坏机器运动和较后的宪章运动，便是以本身的弱点而致失败的。但英国工人阶级改造世界的意愿和憧憬却坚强地存在着。就是基于这一憧憬，产生了英国文学中的革命浪漫主义。

诗人雪莱（1792—1822）出生在富豪的贵族家庭，他所进的学校也是专为培养贵族子弟而设的，先是在伊顿中学，一八一〇年进入牛津大学。可是，雪莱自始即对于当时由教会的蒙昧主义所严格控制的大中学教育深感不满。在牛津大学不过半年，便因为散发了自己所写的小册子“无神论的必要”而被学校开除出去。这激怒了他顽固的父亲，家庭从此和他断绝了关系，只保留对他微薄的金钱接济。他原有的未婚妻也和他解除了婚约。从此，自十九岁开始，雪莱就成了被上层社会排挤出去的流浪儿，但同时，一个日益坚决的革命者也逐渐成长起来。

生活的贫困颠沛，再加以社会的诽谤和迫害，却丝毫没有顿挫雪莱的坚毅的意志。他本人就象他所歌唱的“云雀”一样，带着欢乐的歌唱直飞向他所向往的天空，从没有回顾和反悔。在资产阶级看来，他是“疯狂的雪莱”，是“毒蛇”；十九世纪英国批评家马太·安诺德有一句“名言”论及雪莱说：雪莱是一个“美丽的然而不切实际的安琪儿，枉然在空中拍着他闪烁的银色的翅

勝。”<sup>①</sup> 这就是资产阶级評論家在最好的情况下所能看到的一切了！喜爱黑暗的人对光明是盲目的，因此安諾德认为雪萊的詩“缺乏內容”。可是，够了！讓我們看看雪萊是怎样成长为革命浪漫主义者的吧。

給年輕詩人的心灵以深刻启发的，首先約有三方面的影响：一是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是闡述进步思想的书籍（政論方面如威廉·葛德汶的“政治的正义”、托瑪斯·潘恩的“人权論”；哲学方面如洛克、休謨及斯宾諾沙的論著）；而最后和最有力的影响自然是詩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是当时英国和欧洲的社会及政治运动。

雪萊在中学和大学时期，对物理、化学和电学都抱有极大的兴趣，并且在自己的住屋中堆滿了仪器，进行了很多試驗。他认为自然科学会使人認識到自然界的秘密，帮助人成为世界的主宰者，从而可以把人从“偏見”和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虽然在离开学校后，他就不再接触实验科学了，但对科学的爱好已經給他的推崇理性和对世界的唯物認識奠定了基础。

詩人早年的政治見解固然部分地由閱讀书籍而形成，但更主要的是生活本身使他認識到英国的现实。这，我們可以由他当时所写的书信中看出来。

离校不久，他到了凱斯維克，就是湖畔詩人华滋华斯在那儿歌頌自然之美的地方。但雪萊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景象：“我看到

<sup>①</sup> 今日的“劍橋英国文学簡史”认为这句话未免美化了詩人，它說：“这是并不十分符合事实的。在雪萊的一生中有很多不美丽、不无实际效果和非尽天使般的作为。”这本文学史甚至說，拜倫、雪萊和济慈三詩人的早亡，“仿佛是对明显的罪恶的判决”。

了悲慘的景象。工人們处于飢寒中。我們的士兵被派到諾廷漢去了……若果他們是為了去殺死當地任何一個飢民的話，詛上天詛咒他們吧。”他又寫道：“在這凱斯維克，雖然風景是可愛的，但人們却可憎。廠主們帶着他們的污濁伸進了這平靜的山谷，以人的惡濁破壞了自然的美。來到這裡的大家族們，他們荒淫的奴仆也有助於使道德整個淪喪。凱斯維克與其說是坎伯蘭郡的一個村落，勿寧說更象倫敦的近郊。河裡常常發現被不幸的女工所扼殺的孩子。”不久之後，他到了愛爾蘭的首府都柏林，他寫道：“在這以前，我從沒有想到人間的悲慘可以達到如此地步。都柏林的窮人確實是最不幸最悲慘的了。在他們那狹小的街上，彷彿有成千人在一起蹣跚着——簡直是一堆活人的垃圾。這種情景多么巨烈地震動了我！”

雪萊在寫過“無神論的必要”攻擊宗教的權威以後，次年（1812年）二月十二日便帶着新婚妻子海瑞特和自己所寫的“告愛爾蘭人民”小冊子，到愛爾蘭去鼓動當地的民族革命。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实际革命工作，對他此後的发展有極其重要的影响。在“告愛爾蘭人民”里，他寫道：“人們侈言貧窮不是惡端，——他們定是沒有身受，否則就不会这样想的。”“被統治者應該過問政府的工作。”“戰爭對你們的幸福和安全難道是必要的嗎？窮人從國家的財富或疆域的擴展得不到任何好處，他們從‘光榮’得不到什麼，這個字眼不過是政治家用來掩飾他們的野心或貪婪罷了……窮人用自己的血、勞作、快樂和美德當作代價，來買這‘光榮’和這財富。他們為了這魔鬼的事業而戰死沙場。可悲的是：下層人民所以犧牲自己的生命和自由，不過為了使壓迫者更凶殘地壓迫他們而已。可悲的是，窮人必須把

那使他們全家免于飢寒的財物当作稅款交出来。……許多丰衣足食无所用心的人們在斥責改革；狠心的、或者无所用心的人們呵，有多少人正在你們权衡利害时忍飢挨餓，有多少人正为了助成你們的快乐而死去。”

这篇文告的煽动力是显然的，尤其可貴的是，它的立論完全站在赤貧的无产階級一方面。只可惜，由于雪萊当时深受葛德汶的改良主义政論的影响，这篇文告的結論还不是号召人們拿起武器来斗争，而是主張“节制、冷靜、仁慈和自持能給你們带来美德，閱讀、会談和思索能給你們带来智慧，等你們有了这些，你們就可以反抗暴君了”。

爱琳諾·馬克思說得好，我們不能期望雪萊在他那时代就完全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复杂的过程及其后果。重要的是，“他竟能看出这种关系并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来权衡它。只凭这一点，我們就可以把他称为社会主义者”。<sup>①</sup>

雪萊很重視他的爱尔兰之行，他認為“不是最高貴的成功，就是最光荣的殉道”在等待他。他把“告爱尔兰人民”的小册子一面廉价在书肆出售，一面还亲自在都柏林以各种方式散发它。他的妻子海瑞特曾在給希欽諾小姐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相信，你要是看到我們怎样散发小册子，你会大笑的。我們把它从窗口投出去，又把它分发给从我們街上路过的人。这样做时，真要把我笑死了，可是波西（即雪萊——譯者）却严肃得很，昨天他还把一本小册子放在一个妇人的袍兜里呢。她一点也不知道，我們就走过去了。”除此而外，雪萊还把傳单放在用木塞塞好的玻璃

<sup>①</sup> 見爱琳諾·馬克思·艾維林及爱德华·艾維林合著的“雪萊——社会主义者”。这里引文自俄文轉譯。



瓶中，置于海上任其漂流，或者用輕气球把它送往空中。

据当时报纸的記載，雪萊曾在都柏林的劇場中对爱尔兰的貴族們发表演說，效果非常好，很激怒了一些頑固派。

从当时的客觀情勢以及雪萊所采取的行动方式来看，不消說，他是不会成功的。他的行动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和監視，却僥幸沒有被捕。他在一八一二年三月十八日写信給葛德汶說：“我已經把……出售的小册子收回，准备离开都柏林了。……我承認，我想組織无知的人民的計劃是不合时宜的。……我不想再对文盲宣講了。我将期待着我不可能参与的事件的发生，使自己成为因果中之因，而那个果将在我变为灰尘的許多世代以后出現的……”

这时雪萊才不过二十岁，便具有如此天才的远見！我們看到，他早年所形成的革命思想和对未来的坚强的信念，尽其一生未曾改变，并且与日俱增地貫穿在他此后的一切詩作中。他是一个热情而勇敢的革命家，但环境却不允許他在实际的革命活动中有所发展。因此他才轉向写詩，开始以詩为武器，在思想上向私有制和反动派宣战。雪萊夫人在注釋雪萊早年詩作(1814—1815年)时，也有几句话提到这一点。她說：“在这以前，他主要想实现他的政治主張，因此写了一些文章向人民呼吁，号召人民爭取自己的权利；可是現在，他开始感到，行动的时机在英国还没有成熟，只好以笔作为工具，来为較好的一日扫清道路了。”

詩人的这一决定是高貴的；但同时，我們也不能不看到，由于放弃了实际活动和政治斗争，詩人的蓬勃精力和热情不能朝革命最有力的方向去發揮，他的生活也无法和广大人民的生活相結合，这就自然而然引起了他的忧郁和自我怜惜的感情。这

种感情在他此后的抒情詩中也屡見不鮮。

本集最早的七首詩，是詩人在爱尔兰之行前后写出的，鮮明地反映了他这一时期的革命思想。尽管这些詩是所謂“少年之作”(Juvenilia)，在艺术上尚不成熟，一般雪萊的选集都不采用它們，可是，譯者却覺得它們有特別可貴之处：和此后詩人的作品比較起来，是不是特別有一种蓬勃的朝气，一种未受鏗折的天真呈现在这些崇高的詩思中，而是为后来的一些作品所无的？关于这，我不敢武断；但至少，我們可以从这些詩篇領会到詩人赴爱尔兰的革命行动，是被多么明朗的热情和战斗的意識所推动着的！是的，这是一个革命青年所写的詩！它的魅力似乎也正在这里。譯过这些詩以后，再看一八一四年的“詩章”及随后的一些作品，显然生活中的失敗和鏗折已直接或間接影响了詩人的心情了。从这时到一八二二年为止，詩人还活了九年，这九年中他虽然主要地以笔为武器，在思想上作战，但生活上的变化还是很大的，所受的打击也很多。他的第一个妻子海瑞特不能理解他的精神生活，而由于和葛德汶一家人的接近，他热烈地爱上了葛德汶的长女瑪丽，两人在一八一四年七月私奔到瑞士，但同年九月因經濟困难又回到英国。这一时期，雪萊为了躲避債主，一度住到小客棧里去藏身。次年祖父死去，有一小部分遺產归于他，經濟情况才好轉起来；但雪萊从未富有过，因为他一旦稍有进款，便要慷慨地接济友人。一八一六年，由于社会輿論的迫害，又鉴于国外生活比較低廉，他和瑪丽再度去到瑞士，并在日内瓦和拜倫結識起来。不久思乡思又回到英国。就在这一年，最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瑪丽的妹妹范妮自杀而死，人們傳說是因为单恋雪萊的緣故；接着，詩人的前妻海瑞特也投河自杀，遺

下了雪萊的两个孩子，这成了涉訟的对象。她的家人声称詩人沒有教養子女的資格，而反动的托利党政府以雪萊是无神論者為借口，竟剝奪了雪萊撫養子女的权利，把他們判給外人撫養了。詩人对此極為憤慨，便在一八一八年三月全家移居意大利，从此再也沒有回到英国。一八二二年七月八日，雪萊和友人威廉斯自斯培茲亞海港泛舟去雷亨，中途遇風暴，溺死海中。

雪萊的一生是战斗的，但由于他是独自和反动势力斗争而沒有和工人階級在生活上打成一片，他的一生也是显得孤独的。他自己深刻地感到了这一点。在一八一九年四月六日，他給友人写信說：“我想，除了五个人以外，凡是知道或听說到我的人都把我看作是罪惡和墮落所造成的稀世怪物了。”这样一种孤寂的、被敌意所包圍的生活，如前所說，自然要引起不健康的情緒，使詩人不断地想到死，想到生活的虛妄和世事的无常了。因此，我們就看到象“无常”、“咏死”、“往昔”、“招苦難”、“长逝的时流”、“秋”、“時間”等一类詩。<sup>①</sup>这是可以理解的：忧郁的心情是这样一种战士有时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事情还不止于此。由于精神有了苦悶，自然要寻找解脫，于是雪萊在某些方面找到了唯心主义的柏拉图哲学。当生活整个与自己为敌的时候，也許唯心哲学是較容易找到的遁逃藪吧？这种說法，自然并不是要追寻詩人自覺的意識过程。雪萊是严肃的思想家，他所以推崇柏拉图哲学，自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例如：可以和教会的宣道對抗）；不过，尽管如此，我們还是可以看到，詩人引用在他詩中的一部分唯心哲学，也是很投合抑郁的心情的。那哲学告訴人說，

① 自然，这些詩并不尽是消极的方面；当詩人感于世事的变迁时，他也看到苦難只是暫时的，美好的一日必將到来。这也就提供了乐观的基础。

这世界的一切都是假象，另有一个更真实的、理念或精神的世界，它是非物质性的，完美的，永恒的，我们这个多变而不完美的物质世界就是它的投影。关于这，柏拉图曾作过一个著名的比喻。他说，人类大多数仿佛是坐在地下岩洞中的囚徒，背对着火，火光把影子投射在岩壁上，人们便把这影子当作现实的世界。只有少数人（哲学家）转过身来，走上陡峭的石级，才能看到上面的阳光世界，看到“真实”。因此，要获得真理，就要把“灵魂的眼睛转过来”面对太阳，面对那个“真实的世界”。在柏拉图哲学中，这“真实的世界”有时叫作“理念”、“精神”或者“一”（与“多”相对）。

不难看到，雪莱的诗中有不少推理和形象是采自这种柏拉图哲学的。举例说，“别揭开这画帷”这首十四行诗就明显地把生活比作“画帷”和“幽深的穴中”的“幻相”。“颂天”中把天比作“人的头脑的第一层”，认为还有更高的“欢乐世界”在天外移行，如果能看到这个“世界”，那“天”就“不过象是从梦乡把日午的反射了望”罢了。柏拉图认为在理念中尚有至高的理念，这篇诗里正是反映了这一思想。“赞精神的美”也是歌颂了柏拉图哲学的一种神秘经验。这虽是一首充满了真实热情的诗，但却奇异地构制在形而上哲学的基础上。在冷酷的、灰色的、扑灭了一切高贵行动的火焰的现实中，谁能不缅怀于他曾有过的光辉的一刻，并期望那一刻的再现呢？诗人正是把这样一种生活实感通过唯心哲学的探索透露给我们。诗中所谓“精神的美”、“渺冥的灵气”、“美底精灵”、“较高的世界”，实则都是一个东西，就是诗人所看到的宇宙精神，就是“一”，万物由于充沛了它而发出光彩，大地失去了它就变为暗淡。人们由于无知，用“鬼怪”“天庭”等富于魅力的名称去称呼它。在初春，当诗人正在推究生命的

奥秘的时候，他突然感到了与这种精神的融和，于是狂喜地握紧两手。诗人在该诗结尾说，就是这种宇宙精神使他知道克制自己的情欲并热爱全人类的，他希望能够长期充沛它，因为它能给他带来人不再奴役人的希望。

由此看来，雪莱之所以接受柏拉图哲学，基本上还是出于改造世界的意愿，出于求真的精神；他要追寻宇宙的秘密，要掌握自然与人间一切现象的总规律，因为在他看来，只有认清了这一规律，才能顺利进行改造世界的工作。斯宾塞的泛神论也是沿着同一追求的途径化进了他的诗里。举例看，象“爱底哲学”这样一首迷人的小诗，岂不是充满了这类哲学的影子吗？

泉水总是向河水汇流，  
河水又汇入海中，  
天宇的轻风永远融有  
一种甜蜜的感情；  
世上哪有什么孤另另？  
万物由于自然律  
都必融汇于一种精神。  
何以你我却独异？

你看高山在吻着碧空，  
波浪也相互拥抱；  
谁曾见花儿彼此不容：  
姐妹把兄弟轻蔑？  
阳光紧紧地拥抱大地，

月光在吻着海波：  
但这些接吻又有何益，  
要是你不肯吻我？

这里既有泛神論，把“泉水”“輕风”“高山”“波浪”“阳光”等都看做是有生命的东西，和人同样是一种精神的体现物；又有柏拉图哲学关于灵魂的学說——就是，人的灵魂原是两性具备的、完整的，进入肉体后即变为分裂的存在，因此它永远追寻与它的另一半相結合；自然界也如此，“多”总是企图向“一”汇合，所以泉水汇入河水，河水汇入大海。大海和太阳都是“一”的象征，万物“都必融于一种精神”，亦即融于普在的爱情、融于宇宙精神中。这首诗以对爱人劝告的方式、以爱情的語言精煉地表现了詩人的一整套思想，确可以說是把动人的感性形象和丰富的說理美妙地結合起来了。

唯心哲学使詩人相信，人死后还有精神的存在，坟墓的那边并不就是黑暗和空虛，而是更美好的真实；因为，現世的缺陷和无常是不会被帶到“那边”去的。这思想較明显地表现在后期詩作如“阿童尼”里面。在那首詩的結尾，詩人說，死去的阿童尼“沒有死，也沒有睡，他不过是从生之迷梦中苏醒”，反而是活人迷于恶梦，象尸身一样在腐蝕着。这思想，就其否定生存的积极意义一点来看，自然是詩人的薄弱的一面。

我們可以說，唯心思想是詩人积郁的胸怀的必然产物；但同时，我們更應該看到，它也是社会历史的一种产物，因为在一定的科学水平限制下，詩人对世界还不能达到更完善的解釋。这給他的詩带来了不可否認的弱点，如某些詩和某些片断在表現上

的晦澀與朦朧即是。可是，我們不能因此說，它帶來的就全是弱點。因為，如前指出，它正是體現了詩人對積極的世界觀的一種追求；詩人從中所選取的，往往是符合於他的樂觀的信仰的那一部分思想，如“愛底哲學”所表現的就是如此。泛神論固然有其唯心的一面，但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也是一種進步思想。恩格斯說過，“泛神論是達到自由的、人的觀點的最後一步，”<sup>①</sup>似乎就正是這個意思。柏拉圖哲學相信人有一切崇高的性能，相信“理想國”，這不也恰好和詩人改造世界的理想趨於一致嗎？

但是，更重要的，我們還應看到詩人是十八世紀啟蒙運動和唯物主義的繼承者。現實的感受比哲學的泛泛之論要強烈得多；詩人生活在王權和教會的雙重統治下，他要以詩來對階級壓迫的種種罪惡現象作鬥爭，這就不可能不使他成為一個唯物主義者。因此，我們看到，當詩人以堅決的革命者的身份來講話的時候，他的詩就飽含着清醒的現實感覺，他的刻繪就中肯而有力，他的聲音也成了廣大人民的呼聲。而且，詩人越是為現實所激怒，他的洞徹一切的理性就越占上風，他的詩也就更清晰地閃耀着現實主義的光芒。“寫於卡色瑞統治期間”、“一八一九年的英國”、“給英國人民的歌”、“一只新國歌”、“頌詩”、“自由頌”、“自由”和“‘虐政’底假面遊行”等詩中所刻繪的現實，在今日看來仍然具有其驚人的現實意義。資產階級的批評家時常“惋惜”說，雪萊的詩把事物描寫得過於黑白分明了，失去了朦朧的詩意；但在我們看來，詩人愛憎分明，他全力歌頌光明和未來，又全力痛斥剝削、偽善和一切惡勢力，這正是他的詩的真實的優點。誰

---

① 見恩格斯的“英國狀況”，此處自俄文轉譯。

要是覺得雪萊只不過是一個天真的、不切實際的詩人而已，他可以看看以上所舉的詩是多麼明確地掌握了現實和歷史的辯證發展！在卡色瑞統治期間，亦即反動勢力看來最強大而穩固的期間，詩人已經能看出自由底劊子手們是在走向墳墓了；他能從“死亡”、“毀滅”、“罪惡”和“財富”的歡笑的筵席上聽到它們自我“毀掉！”的聲音。他能看出資產階級的“民主”的虛偽性，說“議會”把“時間最壞的法令還不廢除”。他能看到資產階級的上層建築宗教和法律都是欺騙人民的，是“害人的陷阱”。他斷言“奴隸和暴君原是雙生的仇敵”，因為，他相信，只要奴隸不肯自居為奴隸，暴君也就不存在了。他看到唯有“飢餓”和“苦辛”——亦即唯有無產者——才是自由女神的侍奉者，而他勸告無產者不要為那“合伙的打劫”（亦即由資本主義國家或國王們所挑起的戰爭）伸手支援，“你們是自由底兒子，只為她而戰”。詩人對人類的壓迫者“帝王”和精神的奴役者“教士”投以最深刻的憎恨：

但愿自由人能把这名字：“帝王”，  
踐踏为紆尘！不然，就写在土里，  
好使这污漬在名譽之頁上  
有如蛇蝎的足迹，将被风的呼吸  
所抹去，被平沙从后面复盖！<sup>①</sup>

對於教士，他說：

---

① 這些話不禁使我們想起詩人較早所寫的“奧西曼德斯”那首諷刺“帝王偉業”的傑作。



哦，但愿智者能以他們的头脑  
照明这幽暗的世界的大廈，  
使“教士”，这蒼白的名字，退縮到  
地獄里：这才是它原来的家，——  
它本是魔鬼瀆神的一声嘲笑；

詩人对未来，对人的光明品質从沒有丧失过信心。他相信，是愚昧和欺騙使人民暂时尊奉了“压制”和“压制者”的，只要一旦自由底概念从人的精神深处把“智慧”引来，人类就会凭这“智慧”而获得解放。

在摘自长詩“希腊”的“世界的偉大时代重又降临”一詩中，雪萊表現了他經常持有的思想，即世界的黄金时期是在未来，而不在过去（和华滋华斯等消极浪漫主义者恰恰相反）；他相信，在未来，帝国和宗教都将成为“殘梦的遗迹”，財富和战争再也不致于蹂躪人类了。这是多么真实的預言呵！在“‘虐政’底假面游行”一詩中，詩人完全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規定了“自由”的內容。什么是自由呢？对于工人，自由就是面包，衣服，炉火，和享有一个快乐而整洁的家庭；自由就是对富人的“一种克制”；自由就是公理，智慧，和平；自由是爱情，它的明灯是科学、詩歌和思想。由此看来，早在一个半世紀以前，雪萊就已完全明了“自由”不能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有階級性的；这一階級的自由就意味着另一階級的不自由。同时，自由作为一种精神状态，也必須有其物質基础，貧困的人們是談不到自由的。因此，他号召无产階級說：